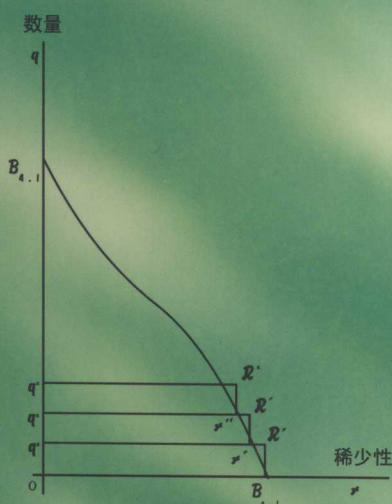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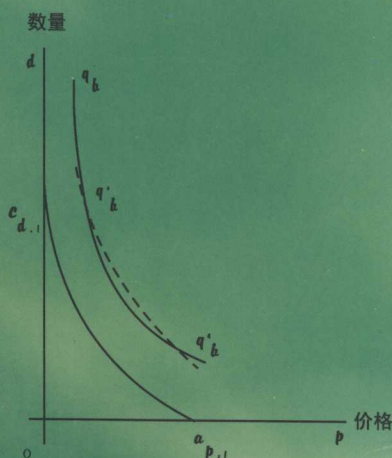


边际经济学派主要思想述评

兼评均衡理论、非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方法

黄志贤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边际经济学派主要思想述评

——兼评均衡理论、非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方法

黄志贤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际经济学派主要思想述评 / 黄志贤主编.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9. 1

ISBN 7-205-04458-8

I. 边… II. 黄… III. 边际经济学派-经济思想-思想评论
IV. F09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40746 号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市宏业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1,000 千字 印张: 11.125

印数: 1-1,000 册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陶 然

版式设计: 张 钧

封面设计: 杨 勇

责任校对: 范国增

定价: 15.00 元

目 录

代序（附记） 古典经济学的解体的庸俗化	黄志贤（1）
杰文斯经济学方法论评述	王瑞芳（31）
试论门格尔的主观价值学说	
——评《国民经济学原理》	沈全水（62）
试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	
——评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	马忠友（102）
论维塞尔的边际理论	方和荣（147）
论时间因素在庞巴卫克经济理论中的地位	杨 晨（184）
论维克塞尔的货币理论	范国增（210）
帕累托经济理论与福利经济学	陈允发（242）
论西方非均衡理论和科尔内非瓦尔拉斯均衡论 ...	洪永妙（279）
对西方经济学的非均衡论与非均衡论的历史考察	郭其友（312）

代序：古典经济学的 解体 and 庸俗化

黄志贤

19 世纪 20 至 30 年代，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就在这个时期中，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了大卫·李嘉图 (D. Ricardo)，得到最高的发展，也是最后的不能超越的界限。在 20 年代，英国发生了经济学的论战。在这个 10 年中（即从 1820 年至 1830 年），英国经济学的科学活动极为活跃。^①李嘉图的经济理论在这场论战中被庸俗化了，他的整个经济学体系也终于解体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逐渐抬头，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大转折。转入 30 年代，出现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新的阶级斗争；同时，20 年代经济学论战暴露的问题，促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尝试从客观方面（从单纯的物质条件或人与人的经济关系）转向主观心理方面来解释经济现象，这就是西尼耳 (N. W. Senior) 的经济学体系。西尼耳用主观心理因素来阐述经济问题的企图，由于多少还用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外观装扮起来，在当时或许不那么引人注目，但随着后来事态的发展，令人强烈地感觉到了。那就是 70 年代，奥地利、英国、瑞士等国主观经济学开始流行起来，并几乎占据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论坛。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之从客观方面转向主观心理方面，可以说又是一个重大转折。

本文试图分析 19 世纪 20 至 30 年代这个历史时期资产阶级

政治经济学所发生的重大转折。

一、李嘉图经济学体系成为论争的集中点

转入 19 世纪，在英国，由于一些特殊事件，使经济理论的讨论渐趋热烈。1815 年英国议会通过“谷物法”，这个法令有利于土地贵族，却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此外，旧的信用货币制度，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围绕谷物法的存废和信用货币制度的改变等具体经济问题的争论，发展成为经济学上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大争论。争论最初是由地租问题引起的，它的展开实质是关于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怎样才能作到最有利于资本家的积累。马克思指出：在 20 年代英国掀起的经济学论争是“关于从工人那里掠夺来的赃物应该怎样在工业资本家和游手好闲的土地所有者等之间进行分配才最有利于积累……”。^②当时李嘉图发现利润率有下降的自然趋势，但是他不懂得利润下降的根本原因，认为那是由于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并由此引起货币工资的提高造成的。因为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一方面地租增加了，另一方面引起货币工资的提高，最后导致利润率、利润的下降。在李嘉图看来，利润率是资本积累的动力，也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动力，过低的利润率，资本积累将会停止，社会也不能再前进。这种情况是他最担忧的，也是他极力反对的。早在英国下议院讨论谷物法的前夕，李嘉图作为坚决维护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就公开揭露：“地主的利益是同社会中其他各阶级的利益对立的。当粮食短缺，价昂时，他所处的就是再好没有的境地，而一切其他人们则由于能取得低价粮食而受益非浅”^③他认识到要清楚说明分配，说明社会各个阶级在社会总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必须首先说明商品价值，而价值问题是个难题。他在 1816 年 2 月 7 日写给马尔萨斯（T·R·Malthus）的一封信中说道：“在清楚地理解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的起源与法则方面存在着很多困难，如果我能克服

这些困难，这一场战斗就赢得一半了”。^④后来，李嘉图在他的不朽巨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中又指出在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中，造成错误和分歧意见最多的，莫过于有关价值一词的含糊观念”。^⑤虽然李嘉图特别强调“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⑥但他却比以前和同时代的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更强调价值问题在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突出地位，认为需用大力气去搞清楚它。李嘉图在研究方法上承继斯密（A·Smith）的“内在方法”，在理论上比斯密要一贯得多，彻底得多。坚持“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⑦并阐明其他经济范畴同这个基础和出发点适合或矛盾到什么程度。他纠正了斯密的错误的价值定义，即商品价值的大小与它们所能交换的这种标准尺度的量成比例。同时，抛弃商品价值由收入构成的错误观点。他坚持商品价值的大小同它们生产上投下的劳动量成比例。他据此阐明工资、利润、地租之间的对立，从而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在政治经济学中抓住了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这是李嘉图的科学功绩。

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上提出的一些正确观点，遭到萨伊（J·B·Say）、马尔萨斯、托伦斯（R·Torrens）、贝利（S·Bailey）等人的反对。比如李嘉图明确指出：“效用对于交换价值说来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却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⑧“使用价值无法用任何已知的标准加以衡量，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估价”。^⑨他表明商品价值只与劳动联系着，绝不应从效用引出来。这是与萨伊的效用价值论截然相反的。李嘉图又驳斥“商品价值完全取决于供给对需求或需求对供给的比例的看法”，认为这种看法是谬误的。供求比例仅“暂时影响商品的市场价值”，“最后支配商品价格的是生产成本”。^⑩他指出供求关系对价值的说明毫

无意义，完全可以把它撇开。李嘉图把利润包括在生产费用中，但是，他把货币生产费用的基础，归结为商品生产上所耗费的劳动。这又是与马尔萨斯的庸俗价值论相对立的。

李嘉图的理论包含若干不明确、矛盾，甚至混乱的东西，这些被庸俗经济学家所利用，作为攻击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论据。比如他提出“商品相对价值”和“商品绝对价值”的概念，但他没有把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和相互关系说清楚。^⑪他在论述过程中，经常忘记实际价值或绝对价值，只是念念不忘相对价值或比较价值。^⑫这是由于李嘉图缺乏历史观点，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一种永恒的不变的自然秩序，只注意价值量的分析，忽视价值形式的分析，所以，对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内在联系，未能做出任何说明。^⑬他的这个“绝对价值或实际价值”的概念受到托伦斯、贝利的攻击。

虽然李嘉图纠正了斯密关于商品价值规定问题生产上耗费的劳动量与“劳动的价值”（劳动的报酬）的混淆，但是，他根本不理解斯密从一个价值定义转向与之完全相反的另一价值定义时所遇到的矛盾。同时，他也和斯密等人一样接受“劳动的价值”这个不合理的用语。其实，“劳动的价值”就是劳动力价值^⑭“劳动的价值”又怎样决定呢？像贝利揭露的那样，李嘉图避开会推翻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采取“巧妙的手法”：“劳动的价值”由生产工人生活和延续其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劳动量来决定。^⑮可是，对于资本同雇佣劳动的交换，却是用劳动本身同商品对立起来，也就是用一定量直接劳动（活劳动）同一定量物化劳动对立起来。这就不能解决问题。只要不能区别劳动和劳动力，无论如何，决不能解释清楚资本与雇佣劳动相交换的这种少量劳动与多量劳动相交换的情况，并不违背价值规律，而是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是李嘉图体系的一个难关、弱点，正是这个弱点，促进李嘉图学派的解体。^⑯

李嘉图体系的破绽，与他对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性质，没有给予明确的说明是密切关联着的。他没有把剩余价值从利润这一具体形态抽出来，在研究价值的规定时，就先把一般利润率当作前提假定提出来，这样，跳过了剩余价值之转化为利润、价值之转化为生产价格这些中项，结果把剩余价值和利润，价值和生产价格混同起来。李嘉图把包括利润的生产费用（即生产价格、费用价格）当成自然价格，便认为“自然价格与价值是同义的”，“商品的实际价值跟它的生产成本是一回事”。^①这样看问题，就无从说明费用价格之偏离价值怎么成为可能，也就无法解决价格规律与同量资本得到同量利润之间的矛盾。这是李嘉图体系的另一个难关、弱点。他自己是感知这个困难的，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第2版到第3版这段期间曾经认为商品价值不是由一个原因，而是由两个原因即“商品生产所需的相对劳动量以及其送上市场以前资本积压时期的利润率”决定的。^②后来，他又坚决认为商品上耗用的劳动量决定价值是“最接近于真理”的，^③“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④总之，李嘉图理论体系中明摆着的两个难关，是他和他的门徒难以克服的。争论就集中在李嘉图一人身上，反对李嘉图的人紧紧抓住这两个难关，妄图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从而推翻李嘉图的整个理论体系，维护李嘉图理论体系的人想尽各种办法试图将上述的矛盾给予解释，结果反而导致李嘉图理论体系的解体。但是，不论哪一方，都在促成经济学的庸俗化。马克思说：“随着李嘉图的出现和由他引起的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庸俗经济学也得到了新的营养”。^⑤

二、在反对与“维护”李嘉图经济学体系的斗争中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抬头

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负有盛誉，使马尔

萨斯大为嫉忌，他于 1820 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与李嘉图的经济理论相对抗。在 19 世纪 20 年代展开的这场政治经济学论争，实际上，在 10 年代末就开始了，李嘉图和麦克库洛赫（J·R·MacCulloch）、詹·穆勒（J·Mill）、马尔萨斯、托伦斯等人之间已有所争论。只是进入 20 年代随着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21 年）出第 3 版，争论愈来愈活跃。他们通过专著、报刊、杂志、“政治经济学俱乐部”^②以及私人之间的书信往来，进行公开的和内部的争论，气氛甚是热烈。

代表英国地主贵族和僧侣这个特权阶级利益的马尔萨斯同李嘉图及其门徒之间的争论特别突出。马尔萨斯力求发展斯密理论中的弱点，极力歪曲价值的规定和价值对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他把庸俗的供求论和庸俗的生产费用论结合起来，以此反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一方面，他强调需求的重要意义，认为它取决于所谓：“需求强度”，即为满足欲望而支付较大代价的愿望和能力；^③另一方面，用生产费用来决定供给。他按照竞争中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认为生产费用是等于工资、利润、地租。支付这些费用就是价值的原因。象商品中所费的劳动，只是构成价值的主要原因，它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④他表明李嘉图说的“除少数例外而外，商品上所耗用的劳动量决定其互相交换的比例这一命题根据不足”。^⑤他认为商品在生产上使用了大量的固定资本；还有不论是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都得经历相当一段周转时间，这使商品的交换价值随着利润率和利润量的变动而变动，因此，绝不是像李嘉图所说的那样是“例外”，这类商品数量很多，交换价值之随利润率和利润量的变动是经常发生的，是一种“通则”。他说：“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这些例外的品类，就会发现其为数之多，使得该法则可以看成是例外，而例外倒成为法则了”。^⑥于是，他采用斯密一个不正确的价值定义：商品价值是以各该商品在各该时期所能换取的或支配的劳动来衡量。这个所能

换取或支配的劳动量就等于：“商品中所包含的积累的和直接的劳动，加上全部垫支项目在垫支期间的一般利润”。^⑦

李嘉图不能解决价值规律同同量资本得到同量利润规律之间的矛盾，是因为他混同了价值和生产价格。马尔萨斯则固执着从竞争的表面现象得到的：商品是以预付（垫支）资本加按预付资本计算的利润率出卖，也就是用生产费用决定商品价值，从而否定生产上耗费劳动决定价值。作为生产费用的两个主要要素即工资率和利润率，马尔萨斯认为其中的利润率“特别易于变动，并且突出地依赖供求关系”。^⑧这样，他又从生产费用大小的决定转到交换领域，以换到的劳动多少来决定。马尔萨斯确实看到资本和雇佣劳动相交换，是少量劳动同多量劳动相交换，并强调这种不平等的交换。但是，他不愿理解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其中实际有一部分是有酬的，而另一部分劳动是无酬的，正是这部分无酬劳动构成利润。他总是认为一定的劳动量同它交换的工资，必定是有相等的价值，这就把李嘉图已经分开了的“劳动量”和“劳动的价值”（即工资）又再混同起来，把劳动当成是全部有酬的。于是，就采用“把商品的购买（交换）变成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交换这样一个办法”，^⑨也就是“把商品的价值和商品作为资本的价值增殖混同起来”，^⑩以此来解决李嘉图未能解决的另一个难题。既然利润不是在生产中创造的，而是通过商品的购买得到的，那么，利润必定是在出卖商品时高于商品的价值得来的，也就是商品贱买贵卖产生的。马尔萨斯在最后又重回到重商主义的让渡利润的庸俗观点！

马尔萨斯对利润的来源作这样的解释，自有其阶级用意。他想借此来说明那些不生产只消费的地主、年金领取者、领干薪者、牧师以及他们的一大帮家仆、侍从的存在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他们只买不卖，所以资本家才能实现自己的利润。当然，资本家在事前理应把尽可能大的一部分产品，以地租、^⑪赋税等形式

缴交他们。马尔萨斯竭力鼓吹“经常的消费过度和寄生者占有尽可能多的年产品是生产的必要条件”。^③而且，把这说成是资本主义避免普遍生产过剩危机的唯一办法。

马尔萨斯与李嘉图之间的论争的尖锐性，这同各自对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解紧密联系着。李嘉图在写给马尔萨斯的一封信里说明了他们两人在这个方面存在的分歧：“你以为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对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我以为还不如说是对某些规律的研究，这些规律决定着在财富形成之中同时发生的各阶级之间的工业产品的分配”。^④此外，还有来自方法论的分歧，他认为马尔萨斯“总是记住那些特殊变化的直接和暂时的影响”，他自己则把这些影响“撇在一边，把整个注意力放于事物产生的永久状态上”。马尔萨斯的复信，以“社会进步包含不规则的运动”为理由而否定李嘉图的意见。马尔萨斯的《原理》‘导论’中也表示：“哲学的首要任务是说明事物的现状”，“既为了防止理论的繁杂，也是为了证实那些有根据的理论，对事实的广泛的注意是必须的”。后来托伦斯把他们两个人方法的差异简单地归结为：李嘉图的“一般化”太多，而马尔萨斯的“一般化”太少。^⑤实则，李嘉图坚持的是揭露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的科学方法，而马尔萨斯等只注意竞争中引人注目的现象差别。

托伦斯也同李嘉图及其门徒发生论争。据说他还是第一个认真提出反对意见的人。^⑥1818年2月李嘉图同托伦斯有过一次关于价值论的长谈，但彼此都没能说服对方。^⑦同年10月托伦斯在《爱丁堡杂志与文学杂记》上发表文章，题为：《对李嘉图先生的交换价值理论的非难》。^⑧到了20年代，他们之间的争论继续着（他对李嘉图的某些意见不是完全反对，也有赞同的）。托伦斯的《论财富的生产》（1821）一书，也是抓住李嘉图体系中价值规律和同量资本得到同量利润之间的矛盾，来否定劳动价值论。他依据斯密的观点，认为只在“社会发展初期，商品的相对价值才由

花费在商品上的劳动（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的总量决定”，^⑧但是到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发生分离之后，交换价值就开始由资本量，由积累劳动量决定”。^⑨他看到：两个不同的生产部门它们所使用的资本量相等，而耐久程度不相等，尽管“等量资本或者换句话说，等量积累劳动，往往推动不等量直接劳动；但是这丝毫不改变事情的本质”，^⑩它们在交换价值上是相等的。他也和马尔萨斯同样认为，这不是什么“例外”，而是一种普遍情形。他据此断言：商品价值按照在生产中所使用的资本量成比例，即取决于生产中使用的资本价值。资本价值决定商品价值，这就是托伦斯的资本价值论。他只是把竞争中暴露出来的现象记录下来，结果“把现象本身说成是现象的规律”。^⑪这实际是用价值决定价值的一种循环论证，当时詹姆士·穆勒就指出他的这一错误。^⑫

托伦斯同马尔萨斯不同，明白表示生产费用不包括利润率。他说：“自然价格由生产费用构成，或者换句话说，由生产或制造商品时的资本支出构成，它不可能包括利润率”。^⑬他不同意马尔萨斯的意见，认为把利润“叫作他的支出的一部分，是荒谬的”。^⑭从资本家来说，他生产商品的费用，的确，除了预付资本的价值，再不会有别的花费，他所理解的生产费用就只是资本价值。^⑮可是，托伦斯却用资本支出去否定劳动耗费，把生产费用当成价值，最后，干脆说价值不存在。托伦斯所以会这样看问题，正如马克思批评的，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方面看到了竞争中的实际现象，另一方面又不理解规律和费用价格规律之间的中介过程”，结果只好“求助于虚构，说是资本而不是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或者确切些说，价值根本不存在”。^⑯

但是，超过预付资本的价值利润既然不存在在生产中，它是怎么来的呢？托伦斯说：“消费者能够和愿意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交换付给商品的部分，大于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资本的一切组成部分”，^⑰这就是说：利润是由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所给的价

格高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资本的那一部分超过额。很明显，托伦斯正好和马尔萨斯走同一条道路，利润不是由生产过程中生出，而是由流通过程中生出的。利润是贱买贵卖来的。马克思揭露道：“托伦斯最后还是脱口说出了利润是让渡利润这种陈旧的天才的观念”。^⑩

贝利则攻击李嘉图把价值看成为某种绝对的东西，而不看成为相对的东西。这一点正好成为他攻击李嘉图整个理论体系的出发点。他说：“价值决不是内在的和绝对的东西”。^⑪在贝利看来，商品的价值纯粹是相对的东西，因为它只表示两个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所以，“价值除了仅仅表示两个物品作为可交换的商品的比例之外，不表示任何肯定的内在的东西”。^⑫贝利不承认商品本身具有绝对价值，只承认商品彼此交换的比例即相对价值、比较价值。他特别强调：“除了通过一定量的另一种商品，就无法表示或表现一种商品的价值”。^⑬

贝利表述了这样一种看法：价值概念只是一种虚构。他认为在商品之外存在着货币，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商品的价值已表现在货币上面，似乎就没有必要进一步考虑价值是什么，这就排除了价值概念！^⑭马克思说：“贝利和其他蠢驴都认为，决定商品的价值就是指找到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找到商品价值的外在尺度”。^⑮贝利显然是把价值和交换价值、价值和价格混同起来，认为它们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贝利还把价值看成是物的属性，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以马克思说他是个拜物教徒。

贝利从自己的价值定义即商品的价值由它交换的其他物品的一定量来决定出发，论述劳动的价值的决定，试图推翻李嘉图关于工资和利润对立的观点。他认为：劳动的价值是由它交换的其他物品的一定量来决定，劳动价值的增加或减少，只是“意味着用以交换劳动的商品量的增加或减少”。^⑯至于利润，他认为与劳动不同，“利润”这一用语，却只意味着商品的份额或比例，而

不是一种可以同其他物品相交换的物品”。^⑤贝利在这里关于劳动价值和资本利润的说法，同马尔萨斯的辩护论调是相似的。马尔萨斯说工资等于一定量的使用价值，而利润是价值的比例。贝利说利润是资本的比例。照这样说法：工资是按使用价值来计量，而利润则是按交换价值来计量，这两者之间当然“不存在什么反比，也根本不存在任何比例”，因为那是拿两个没有共同基础的东西相比。贝利和马尔萨斯一起把李嘉图确立的相对工资的概念的科学意义完全否定掉。但是李嘉图的相对工资的概念在经济学上是非常重要的，它实际上是对正确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另一种表达。同时，这一点对理解两个阶级的社会关系也是很重要的。贝利和其他庸俗经济学家总是千方百计要否定李嘉图关于工资与利润对立的学说，就是试图抹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

詹·穆勒和麦克库洛赫表面上维护和遵循李嘉图的理论体系，但实际上，使李嘉图理论体系完全瓦解了。他们试图克服李嘉图理论体系中存在的二大难关，“为了使这些现象符合于基本原则，就求助于最可怜的烦琐哲学的臆造”，^⑥把经济学搞得更加庸俗。

詹·穆勒在抨击贝利等用资本价值来决定商品价值的荒谬观点时，指出一切资本都是由商品构成的，因此，纯粹是劳动的成果。他虽然把生产费用最后归结为劳动，从而，维护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的数量决定的原理，但在反对商品价值受到时间的影响的观点时，却把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庸俗化了。当时，反对用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人，常常举藏在酒窖中的葡萄酒作例子，酒在窖里储存的一段时间里，尽管不再使用资本，也不再使用劳动，可是它的所值比原来的更多。增加的价值即利润，是对资本在这段时间中较长的停留所作的补偿，由此认为应当加上时间对价值的影响。并证明：这中间既然没有劳动的干预，那么说商品价值是纯粹由劳动决定的原理是不正确的。詹·穆勒极力反驳这种观点。他说，藏在酒窖中的葡萄酒必须支付利润，“对这个问

题，只有一个答复，它是劳动的报偿；不是对直接使用在我们所研究的商品上面的劳动，而是通过其他商品——劳动的产品——的媒介所用在它上面的劳动”。^⑧他认为酒窖中的葡萄酒的例子和使用机器的例子是吻合的。比如一架机器是用一百天劳动生产出来，使用机器，也就是在使用劳动。机器就是资本，而资本可称为“蓄积劳动”。^⑨机器是一百天的蓄积劳动，机器没有被完全消耗完，也就是一百天蓄积劳动没有完全用完。至于用去多大一部分，可用间接计算方法，即用年金来偿付一笔资本，比如每年的偿付率为百分之十，那么，每年用去的蓄积劳动是十分之一。詹·穆勒认为蓄积劳动也像手作的直接劳动一样在劳动，所不同的是，“即不是用手直接去做的劳动，而是用手所生产的工具间接去做的劳动”，^⑩对这种劳动的报酬就是利润。他甚至认为可以称利润为劳动工资。由此推断：“如果你可以用工资的数量来计算直接劳动的数量，那你就可以用资本家收益的数量来计算从属劳动的数量”。^⑪詹·穆勒不但没有解决价值规律同等量资本它们耐久程度、周转速度不同却得到同量利润之间的矛盾，反而把问题搞得更混乱。他实际是把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完全混淆起来，把劳动过程结束后仍继续着的生产过程（在酒窖里的葡萄酒继续着它的生产过程，即经受自然力的作用）也算作劳动过程。竟然把蓄积劳动说成也在劳动，它创造价值，从而创造利润！？詹·穆勒和老师李嘉图同样搞不清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区别和联系，不懂得利润之转化为一般利润率，从而，不懂得价值同费用价格的区别，却试图超过任何中介环节，便直接根据价值规律去说明这种现象。这当然不能解决问题。所能做的实际只是在口头上进行诡辩，并试图靠捏造用语和靠改变事物的正确名称，把困难辩解掉。^⑫不过，詹·穆勒的这种手法“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⑬他搞的烦琐哲学，还只是开个头。^⑭到了麦克库洛赫，把这一切发展到顶点。

马克思说：“麦克库洛赫是李嘉图经济理论的庸俗化者，同时是使这个经济理论解体的最可悲的样板，^②麦克库洛赫不但是李嘉图的庸俗化者，而且是詹·穆勒的庸俗化者。他也从窖藏的葡萄酒这个例子出发，追随在詹·穆勒的那个机器例子后面，把庸俗观点更加庸俗化。他说：“当一个商品全部或部分借助于机器而生产时，每一个人都承认，由机器的作用而转入到这个商品中的价值完全是由劳动得来的，但是借助于机器的作用，与发酵的作用以及在桶内完成的其他过程，除了一个能看见，另一个看不见之外，在本质上根本没有一点不同的影子。”^③麦克库洛赫和詹·穆勒一样，认为机器发挥作用，就是在劳动。这同在生产过程中，机器的价值（对比直接劳动新创造的价值，它是旧价值）只是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说法，是根本不同的。李嘉图也只是说：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与投在它们生产上的劳动成比例，这里说的劳动包括投在商品的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和投在实现该种劳动所需要的一切器具或机器上的劳动，^④他从来没有说机器的作用也是劳动，会创造新价值。麦克库洛赫和詹·穆勒把李嘉图的观点庸俗化。詹·穆勒说机器、蓄积劳动在劳动，它创造价值。而麦克库洛赫比詹·穆勒更甚，认为制造葡萄酒的发酵作用和它储存在酒桶之中完成的自然过程也同机器的作用一样，没有根本的不同，都在劳动，都能创造价值。他说：在葡萄酒的生产中，资本对劳动的交换是不必要的，它的结果不是人力所产生，而是“自然本身的作用力在酒桶内产生”。^⑤

麦克库洛赫力图无限制地扩大劳动的概念。他的《为斯密‘国富论’写的注释和补充论述》一书就这么说：“有充分理由可以把劳动下定义为任何一种旨在引起某一合乎愿望的结果的作用或操作，而不管它是由人，由动物，由机器还是由自然力完成的”。^⑥古典经济学定立的人们在商品上所耗费的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科学原理竟然被推广到物所作的种种操作——从詹·穆勒的